



以人为本,才能协调发展,才有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浦东开发开放30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中提到“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要坚持广大人民群众在城市建设和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强调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浦东的开发开放之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在这段建设历程中,复旦研究团队做出了独特而卓越的贡献。

社会科学走出象牙塔 贡献社会发展需求

复旦团队深耕浦东社会发展研究30年纪实

1990年,党中央正式确定开发浦东,1992年以后浦东新区的发展进入快车道。

浦东开发开放初期,新区领导就明确提出:“浦东开发不只是土地开发、项目开发或经济开发,更是社会开发,是争取社会的全面进步。”30年后看,浦东在社会领域做出的贡献与经济领域的成就同样让人刮目相看,这也是浦东与其他一般开发区相比很不一样的地方。

近30年来,复旦研究团队积极回应当时面临的许多复杂社会问题,与浦东新区政府和各界专家学者合作提出了不少具有突破性的治理创新理念和政策建议,为浦东的社会经济发展做出了复旦独特贡献。

1994年,刚刚组建的复旦大学法学院(包括国政系、法律系、社会学系和人口所)就开始启动浦东发展研究。

基于学术前瞻性以及对社会发展的共识,法学院团队和浦东新区社会发展局联合成立了“上海市浦东-复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以下简称“中心”)。该中心以社团法人身份,接受复旦和浦东新区的指导,在基金会的支持下独立开展与新区社会发展相关的学术研究和决策咨询。其本身在当时就是一项创新的组织机构形式。20多年来,中心在彭希哲教授、陈家华教授、梁鸿教授等的主持下,取得了丰硕的学术和咨政成果。

自1996年开始,中心连续每年发布《浦东社会发展报告》(以下简称《发展报告》),是我国启动最早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发展“皮书”系列。

绿皮书主要聚焦三个功能:记录浦东社会发展的轨迹;分析浦东社会发展中的问题和老百姓的基本心态以及感受;为浦东的社会发展事业提供决策建议。《发展报告》研发构建了一系列的发展指标,并邀请各路专家和政府官员撰文,克服了数据资料短缺甚至发展理念的差异的困难,系统地记录和评价浦东新区发展的历程、面临的挑战、取得的成就。

中心每年对1千户经过严格抽样的浦东市民开展民情民意的调研,研究报告呈送新区政府部门,也发表在《发展报告》中。这项连续15年的千户调查,锻炼了研究团队开展高质量社会调查的能力,也支持复旦学者发表了诸多科研成果。

在此期间,学校历任主要领导都对复旦参与浦东社会发展研究给予支持和指导,他们或是担任《发展报告》编委会的主任,或是为《发展报告》写序。于光远、陆学艺等前辈学者也为《发展报告》赐稿。学校各专业的师生也积极参与了千户调查等社会发展研究,戴星翼、范伟达、陆康强、陈月新、闫嘉陵、王菊芬、王桂新、任远、徐柯、郭有德、张真等教师都参与过《发展报告》的研究、编辑或撰稿,校人口研究所和社会学系的很多同学也积极参与过千户调查和《发展报告》的工作,他们的名字不应当被忘记。特别是陈家华教授,长期担任《发展报告》的组织协调和编撰工作,呕心沥血,贡献颇丰。尽管《发展报告》只编辑出版了15年,但确实是一份宝贵的历史文献,是复旦社会科学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成果。

首提社会发展就是投资环境

新区的开发首当其冲是招商引资以推动经济的增长,但新区的经济增长又必须与社会发展同步,社会发展和经济增长不是先后、主次关系,必须同步同力,社会发展和公益事业也是投资环境。新区政府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就逐渐形成这样的认识,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始终不渝地坚持“以人为本,协调发展”战略,并通过《发展报告》从理论研究和实践总结中予以论证和阐释。这些理念层面的研究与讨论,看上去是一种“务虚”,却成为浦东持续高水平发展的理论支持和思想基础。

今天的陆家嘴中心绿地就是个很好的案例。这块区域原先是老城区,按规划动迁后要建成中心绿地,当时很多声音认为,卖掉这块地会有不小的收入,但改成绿地,不仅拿不到钱,还要倒贴,经济上不划算。尽管当时的争论很激烈,但浦东还是坚持保存了这块绿地,其后绿地周边各种发展的经济效益特别好,事实证明在社会事业上的投入对经济发展是有促进作用的。又如,当年浦东基础设施匮乏,新区下决心要建好的学校和医院,曾经在一天里为三所大学、一所中学同时奠基,这种事情可能在中外历史上都不多见。为了把最好的资源留给老百姓,浦东在体制机制方面也有很多突破。当时要求政府审批减少盖章流程,但是,新区在开发商小区公建配套的审批环节,却多加了社会发展局这个章,以确保幼儿园、学校、医院公建配套的不漏不缺。

在社会发展领域,研究团队还系统提出了践行“以人为本”的“三全”理念:要关注人的发展全过程,从生到死;要关注人的全面发展,智力、体力和心力;要关注全人群,不同的性别、不同的职业、强势人群和弱势群体;以保证社会发展惠及所有人。

用社会方法解决社会问题

以社区建设为例,在浦东开发开放初期,由于经济的飞速发展,原有的包括单位制在内的社会格局受到巨大冲击,不少人的社会关系趋于脆弱。中心提出,浦东要率先加快与经济高速发展相匹配的社区建设的力度,帮助人们完成从“单位人”向“社会人”的平稳过渡,建议浦东发展社会组织包括社会工作体系以推动整个社会发展。为此,浦东在全国最早引入了社会工作专业人才,建立了国内第一个城市级的社会工作协会——浦东社工协会,华东师大吴铎教授、复旦大学彭希哲教授和顾东辉教授都曾经长期担任浦东社工协会会长,直接组织领导、参与推动浦东社会工作的发展。浦东社工协会受中国社工协会委托起草社会工作的国家职业标准;首创政府主导、各方协作、市民参与、社团管理的社区服务新模式;孵化以“乐”字辈为典型的民非机构在浦东茁壮成长。复旦学者为浦东新区的社会治理开展理论探索和实践推广,让专业力量发挥作用,帮助人们利用身边的资源解决自身的问题,找到属于自己的社区,建立社会支持网络。

浦东在全国最早开始探索“一门式”社区事务受理中心,针对当时备受百姓诟病的政府各部门窗口服务,将“方便管理”的工作流程改成“方便百姓”的办事流程,在不断试验纠错的过程中,试点取得了很大成效,基本实现了“便捷、透明、亲和”的设计预期,居民的满意度有了很大的提升。《发展报告》称其为“政务模式的一场变革”,对此有深度的研究和总结,这一成功试验后来在全市各街镇全面推广,并进一步推向全国,也成为目前“一网通办”“一网统管”治理模式的初期模式。

在百姓满意度中找差距

中心建立初期,就在浦东进行居民千户调查,问题包括老百姓关心的经济、生活、市政等各方面话题。研究团队精心设计、认真执行,深度开发调查数据,及时反馈民意,探究政府工作和浦东发展中的短板,从市民的意向中寻找差距,推动政府完善政策和服务。

浦东开发开放之初流行“宁要浦西一张床,不要浦东一套房”的民谣,千户调查问卷中有个问题是,如果有机会让你从浦东搬回浦西去,你愿不愿意?从1995年开始,这个问题连问15年,从最初75%的人都说不愿要搬,到15年后,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留在浦东这片希望的热土上。老百姓说,因为看到了浦东的进步,对浦东有信心,愿意留下来也更想留下来,这也直接反映出浦东社会发展的巨大进步。

浦东开发后,高层楼宇迅速增长,人们也为之兴奋。但研究团队在《发展报告》中提出了浦东的城市发展规划不仅要关注平面,也要关注天际线,应当有立体的景观设计。研究团队还针对浦东新区当时的各种民生问题开展调研,对公共文化娱乐设施、基础教育资源配置、卫生事业和养老机构建设等专题都开展过深入的研究,提出过诸多切实可行的对策建议,体现了复旦学者学以致用、心系国家发展和人民福祉的社会责任。

回首30年展望浦东未来

30年后的今天思考浦东开发开放,从经济、社会、法治、生态等许多观察维度,可以发现浦东开发开放不仅是创造了一个经济奇迹,更具进步意义、更为重要、更起长远作用的是,它探索实践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经济与社会持续互动发展的一种全新模式。这种与其他一般经济开发区不同的立意与初心,被充分体现在浦东规划设计、形态布局、投资重点和运营机制上,最终构成了浦东作为一个成功案例的独特意义。上海市浦东-复旦社会发展研究中心的成立本身就具有重大的意义,恰好回应了浦东开发开放这么一个宏大的社会发展的需求。它的出现和它在这15年中所做的贡献以及它所建立的平台,所产生的成果,对整个浦东的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这是一个大学和一个开发新区的一种结合,它的结合是以NGO的形式展开,浦东开发开放的现实让社会科学走出了象牙塔,“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hysical Quality of Life Index,PQLI)、人类发展指数HDI、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等衡量社会发展的工具被引入,并影响政府政策。培育了政府和社会的环保意识、资源意识、社会格局、社会经济关系等社会发展意识。

虽然《浦东社会发展报告》停止于2009年,但研究团队一直持续跟踪浦东的社会发展,持续参与了浦东的人口规划、老龄规划等社会发展规划,形成了《浦东新区产业升级、服务布局与人口发展》、《浦东新区老龄事业发展规划》、《开放进程中的人口与社会发展》等成果。

未来的浦东,要对标最高标准、最好水平,也要进一步在老百姓的满意度中寻找差距。这是浦东“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国理念、中国精神、中国道路”的关键所在。未来三十年浦东会不会再发生非常重大的变化?社会领域怎么来配套,怎么来创新?浦东未来如何在社会领域引领发展?成为复旦人值得持续关注的议题。



中心发布的15本《发展报告》是复旦社会科学参与浦东开发开放的重要成果,是我国启动最早和持续时间最长的区域性发展“绿皮书”系列。

来源/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学院 制图/刘妍琳